

“城/乡”性别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

——重读《哦，香雪》

王侃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文章以“城/乡性别化”的视角重新解读铁凝的短篇成名作《哦，香雪》，以期解读出其叙事内部的现代性逻辑，以及这一现代性逻辑在“新启蒙”等宏大政治修辞的掩饰下对于女性形象的利用、剥削和榨取。通过对这一种叙事逻辑和这一种政治修辞的讨论，试图进一步推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在历史、文化、美学与政治等多个认知维度上的重新厘定。

关键词: 铁凝; 城/乡性别化; 现代性; 新启蒙; 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5) 12-0147-07

铁凝在一篇发表于2003年的谈论短篇小说的文章中曾这样说过：“我看重的是好的短篇给予人的那种猝不及防之感……好的短篇小说在于它能够把这些片断弄得叫人无言以对，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一气呵成的人生，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重要的在于你毕竟被那猝不及防的精彩迷惑过，不过如此的人生，是不可以没有片刻的迷惑，片刻的忘情，甚至于片刻的受骗。”^①这段话与其说铁凝是在揭示关于人生和文学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真理”，不如说她是在自我承认，承认她自己的确有过迷惑、忘情和受骗的人生经历与文学经历。的确，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阐述过自己的写作灵感、写作动机如何地得益于人生遭际中的“迷惑、忘情和受骗”，就这一点而言，铁凝的这番话有类于此。区别只在于，究竟是人生的哪个具体阶段、哪一部或哪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得益于“迷惑、忘情和受骗”，铁凝则向来语焉不详，秘不示人。除非铁凝承认她全部或大部分的人生和文学都不间断地处于“迷惑、忘情和受骗”之中，否则就不能回避、遮挡学术意义上的好奇与追问：究竟是哪一部？

与此同时，铁凝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有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也就是说，她是一位在读者群、批评界、文学圈中有很高认可度的作家。因此，如下追问也自然会跟进：作为读者，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是否也因为她的作品而“迷惑、忘情和受骗”？至甚者，究竟是哪一部？

我想在这样的话语前提下——尽管它可能显得生硬——来讨论我重读铁凝《哦，香雪》的思想和文学感受。这些感受，关乎铁凝，关乎《哦，香雪》，同时也希望这些感受有助于理清另一些更为深刻的命题。

《哦，香雪》创作并发表于1982年，迄今三十余年。批评界讨论铁凝时总绕不过这篇精致的短篇小说，因此，三十余年关于铁凝的研究和评论，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关于《哦，香雪》的研究和评论，成果颇丰。就我目力所及，既有的关于铁凝的研究或批评论述，以看似诚恳、厚道的赞誉居多，“淳朴”、“清丽”、“纯净”、“柔美”、“诗化”、“至善”是这一大拨赞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W102）。

作者简介：王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铁凝《人生可能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文学》2003年第3期。

誉声中高频度的关键词,尤见于对《哦,香雪》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孙犁的奖掖之辞“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①虽偶有以“幼稚”苛责《哦,香雪》的,旋以“感人”、“可爱”等辩辞补之。即使在对铁凝的作品谱系持总体性质疑的批评文章中,《哦,香雪》仍然是批评者倍加肯定、情有独钟的。^②铁凝本人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访谈文章中也声称,《哦,香雪》在其作品谱系中“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③。《哦,香雪》甫一问世即获前辈奖掖,受同侪艳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铁凝以颇可嘉许的勤奋不断刷新、拉伸她的作品谱系,并为自己在读者群、批评界和文学圈赢得了持续的关注度。可以这么认为《哦,香雪》在这三十多年的持续关注中从未失去过受赞誉的地位,而这赞誉,如今已凝为一种文学史结论。

很难说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给予《哦,香雪》的赞誉是因为“受骗”,何况文学写作中的“诈”和“骗”是受美学伦理恩准的,也是被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所喜闻乐见、甘之如饴的。这“诈”或“骗”,集合于“修辞”这一美学范畴,并在虚构性的叙事文类中享有无边的通行特权。一般而言,任何一种修辞都会形成一种多面的、综合的效果,但人们通常只会关注修辞的正面效果,或由作家刻意主打的修辞方向,却容易忽略非正面、非主打的效果和方向,就像人们习惯于聆听声音,却容易忽略静默。《哦,香雪》的“纯净”、“诗化”是一种修辞效果,也是铁凝刻意主打的一个修辞方向。然而,一个山村少女用40个鸡蛋换取一个塑料铅笔盒、摸黑走30里夜路的残酷,在“纯净”、“诗化”的修辞中被高度弱化,这也是一种修辞效果。

本文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试图讨论《哦,香雪》中的修辞弱项,即被主打修辞所削弱甚至遮蔽的方面或方向。对于这个“修辞弱项”的讨论,或许有助于理解铁凝的“迷惑、忘情和受骗”。

《哦,香雪》是一个假借“乡土”的琴壳弹拨“启蒙”这一弦外之音的短篇小说。1980年代伊始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曾令李泽厚生发过如此感慨“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④可以这么认为: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在社会意识或社会思想基础上有着某种相似,即整个社会有一个普遍的、坚定的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对于这个“现代性”的追求,凝聚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先后在两个相隔半世纪的年代里引领着主导的思想潮流。而正是这种“五四”式的思想局面,使得1980年代前期被命名为“新启蒙时代”,嵌入后来的历史记忆。《哦,香雪》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文学产物,逢迎于这一时代的思想要求。“五四”人物胡适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哦,香雪》的构思、写作和问世也是标准的“五四”式的。此际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正开始准备重新接受现代性的全面塑造。因此,这一时期的所谓“启蒙”,其实就是现代性命题和现代性逻辑下的思想宣示。顺理成章的是,《哦,香雪》是被现代性叙事框架所结构的。

“现代性”内涵复杂,不管以何种方式进入对其内涵的讨论,都意味着几何倍数的话语增殖。但“现代性”在进行自我阐明和自我确证时的方法却并不复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简单地说,“现代性”是通过最原始的“二分法”,即通过一系列的二项对立式——比如理性/癫狂、文明/愚昧、进步/落后等——并通过确立前者在价值上的优先地位,来阐明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这个建立在近、现代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建构了城/乡之间的等级结构,拉大了城/乡之间的价值差距,并且在诸如新/旧、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科学/迷信、民主/专制、自由/压抑等等二项

① 孙犁《谈铁凝新作〈哦,香雪〉》,《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② 例如,一篇尖锐批评铁凝的写作道路是持续“走低”的文章,在临近结尾时却夹杂了这样的评述“铁凝似乎是属于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三位一体’的作家……迄今为止,她作为小说家的荣誉主要还建立于《哦,香雪》这个短篇上……一个作家如果有一部作品能真正超越时代,那也可以了。‘香雪’看来具备了这种可能性。”见徐岱《符号的幻影:铁凝小说的诗学审视》,《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不过,视《哦,香雪》为铁凝的“处女作”,显然有误。

③ 赵艳、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

④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87年,第209页。

式的谱系中,使“城”与二项式的前者连接,使“乡”与后者联姻。因此,我们看到,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表达中,宗法制的中国乡村及其文化和日常生活被视为迷信、腐朽、颓败的载体,是“吃人”文化的温床。阿Q、九斤,未庄、鲁镇,由这些符号所指称的“乡土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启蒙话语所应该批判的不二对象。1920年代,由鲁迅所领衔的“乡土写实派”小说,就秉承这样的批判旨意,不遗余力地对“乡土中国”进行了几乎可称之为是全方位的扫荡,文学史并以“忧愤深广”的美学风貌来形容这种批判力量。1980年代,在“新启蒙”的政治修辞与话语感召下,“乡土”继续扮演着丑陋不堪的历史角色,继续呈现着藏污纳垢的文化面貌,继续承受着被严正批判的文学命运。比如,在这个时期的乡土叙事里,乡村不仅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且,在这个“角落”里,因为宗法文化与极“左”政治的合谋,使得“吃人”的历史现象得以延续。实际上,人们一般都忽视了“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因此,当以“爱情”为起点进行批判性的乡土叙事,其实就是要将乡村、将乡土文化、将乡土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定位在相对于“现代性”的负面价值上。《哦,香雪》也不例外。

作为一部不折不扣的乡土小说,《哦,香雪》被严丝合缝地纳入现代性的“城/乡”叙事架构中。但它的“城/乡”架构在文明/愚昧、进步/落后、科学/迷信等二元价值体系之外,植入了一个隐而不显的“男/女”结构的修辞。我将这一修辞称为“城/乡性别化”。

《哦,香雪》的故事发生地——台儿沟,是个“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²的化外之地。“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①不难看出,在铁凝的叙事设定里,“台儿沟”是封闭的、落后的,是与“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话语相颉颃的负面形象,且是被由火车、铁轨等实体符号所表征的现代文明重新“发现”的。铁凝在这里所使用的“发现”一词,语义丰富,细加考辨就不难识别:它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陈述中所使用的“发现”一词同义,而这一“发现”背后的语义是殖民扩张和殖民征服,也就是说,它显示了一种权力或力量上的悬殊对比,这种悬殊对比不仅发生在哥伦布所代表的殖民宗主国与新大陆之间,也发生在由城市、火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与“台儿沟”之间。与此同时,“发现”还寓意“拯救”,它意味着将把“台儿沟”揽进“现代”文明世界的怀抱,使之不再遗落化外。这种既蔑视、轻侮、征服,同时又怀柔、施恩、拯救的分裂态度与狡黠策略,惯见于现代性逻辑下的“城/乡”叙事。

更有意思的是,进一步细读,随之就发现:台儿沟居然是个女儿国。整篇小说,不曾有一个台儿沟的男性出现,他们销声匿迹,似乎都神秘蒸发了。每晚七点,当那列发自北京、只在台儿沟站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准时到站时,在站台上守候已久、齐刷刷涌向火车的全是台儿沟的青年女子。铁凝使用了作家的权利,将台儿沟的男性瞬间统统屏蔽:男人们不仅没有在站台上出现过,也不在姑娘们梳妆打扮、热切盼望火车的过程中出现过,他们不仅是无声的,同时也是无形的。台儿沟的男人们只在小说伊始、在铁凝提到“台儿沟人”的时候,出现在“他们”这个复数代词里。铁凝显然知道台儿沟是有男人的,所以她不得不用“他们”而不是“她们”来指称“台儿沟人”。因此,铁凝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将台儿沟的男人统统予以屏蔽,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小说中唯一以单数形式出现过的男性是香雪的父亲,但这个形象仍然是不在场的,他作为一个木匠、一个木质文具盒的制造者,给香雪带去了贫穷、丑陋的乡土形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屈辱感,他其实是一个被强大的现代文明所去势的男人,当然无以获得“在场”的合法性,只能与台儿沟的其他男人一样,在铁凝的叙事中归于退隐。铁凝颇为成功地对台儿沟施行了一次阉割手术,使之进入一种隐蔽的性别修辞。

而当台儿沟的男人都被屏蔽之后,另一个男性登场了:“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这是个典型的城市青年男性,他不仅拥有因远

^① 本文所引铁凝小说原文,皆参照小说集《哦,香雪》,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年,第137-146页。

离风吹日晒的田地操劳而致的白净皮肤,而且拥有“乘务员”这样高度城市化的现代职业。台儿沟的姑娘有以“小白脸”这样身体化的绰号称呼他的,但最终颇具意味的“北京话”来命名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1980年代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迄今仍是国家经济决策和管理中心。这些巨型信息,由“北京话”所携带、所承载,使得这位年轻男性乘务员形象被迅速地、高度地符号化。这个符号化的形象,与台儿沟的姑娘们相比,在力量上有强烈的不对等感,而这种力量上的强烈不对等感,就由一个男/女结构来表现了。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哦,香雪》中,城市男性是个单数,而台儿沟的女性是个群体,这种“以寡敌众”、“一夫当关”的力量修辞,以性别政治的特有形式加以强调。1980年代初期的乘务员,不需要高学历,也不需要特殊技能,而且这样的职务很有可能得之于家庭“世袭”,得之于现代城市体制所赋予的天然的优越和便利。与《哦,香雪》同一年发表的剧本《绝对信号》,讲述的恰是北京铁路系统内部职工子弟的灰暗生活:他们身处底层,在社会边缘为生存而挣扎,被侮辱与被损害,并不时陷入迷茫与绝望的精神深渊。但是,当他或他们乘着绿皮火车出现在台儿沟时,“底层”、“边缘”、“灰暗”的身份设定瞬间(哪怕只是暂时的)被解除了,他或他们立刻获得了“白净”、“高大”的晴朗面貌。年轻乘务员在台儿沟姑娘的热烈拥戴中,完成了向“菲勒斯中心”迅速而彻底的回归。在台儿沟姑娘的心目中,只有她们当中姿色至优者的凤娇方可与这个年轻乘务员相匹配。城市的“底层”与乡村的“至优”这种“相匹配”、“相对接”的关系,使得“城市”的优越性被突显。因此,当《绝对信号》中的铁路职工子弟在因为生存困境而必须面对艰难的爱情窘局时,《哦,香雪》里的年轻乘务员则身处“性资源”过剩的洋洋自得中。毫无疑问,在《哦,香雪》里,“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与现代性叙事逻辑达成了隐蔽的合谋。换句话说,也就是“性别政治”被曲折、隐微地用于支撑和证明现代性的合法性,同时,现代性也暗度陈仓,投桃报李,使“菲勒斯中心主义”或“性别政治”佐雍得尝,轻巧地化解了其合法性危机。

作为一种隐微修辞,“城/乡”性别化在《哦,香雪》中是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有力度地得以贯彻的。一方面,它以“女儿国”的形态对台儿沟这样的乡村进行了静态的、本质化的性别设定,然后让“火车”这一男性意象大肆侵入。“火车”是“蛇”这一意象的引申或变体,而“蛇”则是“摩西的权杖”的变体,是阳具的象征,是权力和神圣的绝对象征。弗洛伊德曾说“神话和传说中许多用做生殖器象征的动物如鱼、蜗牛、猫、鼠(由于阴毛),在梦中起同样的作用,特别是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蛇尤为如此。”^①而“火车”同时又是“工业化”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表征,因此,它是现代性与男权的交叠,是双重的象征。因此,当铁凝在《哦,香雪》中如此描述“火车”在台儿沟的出现时,其文字无意间滑入了暧昧的性暗示:

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火车”的进入,“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它极其强大、壮观、威严,以致香雪觉得“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台儿沟这个“女性”,不仅因此被重新“发现”,而且因为被“侵入”,她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被重新命名(“台儿沟站”),并成为现代文明播撒其“启蒙”火种的地方,成为承载“新启蒙时代”之历史叙事的空白之页。这个过程极好地诠释了这样的结论“女性是一片有待于发现、进入、命名、播种的土地,最重要的是被拥有……女性被划归到一个超越历史的领域里,因此承担着历史变迁的叙述及其政治影响之间的一种尤为痛苦的关系。”^②

另一方面,台儿沟的女性身份进一步被以一种动态的、实践性和建构性的修辞——一种以“看/

^① 弗洛伊德《释梦》,吕俊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② 转引自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80-81页。

被看”的关系性建构——所确立。从物理形态上看，火车承载了诸多“城市的”、“现代的”内容，比如“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皮书包”、“能松能紧的尼龙袜子”、“女大学生”以及在小说中作为关键物件的泡沫塑料文具盒。与此同时，火车还向台儿沟的姑娘们提供了向内眺望的诸多窗口。但需要指出的是，火车车厢的诸多窗口，其设计的初衷是供车厢内的乘客向外眺望，而不是相反。我们在《哦，香雪》中看到的实际情况的描述也恰恰如此：火车每天晚上七点驶进台儿沟，只停留一分钟，但为了这一分钟，“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对姑娘们的精心打扮和化妆的描写，泄露了将姑娘们置于“被看”境地的真实意图：表面上，是台儿沟的姑娘们通过火车的窗口看世界（当时以及后来的大多数评论都这么认为：“那明亮的车窗，有如开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台儿沟的十七岁的小姑娘们从这里看到了那么多陌生、新奇、令人羡慕、让人兴奋的东西！”^①“姑娘们从火车窗口窥望着、探究着。呵！世界上原来竟有这么多新鲜而引人的事物！……作者表现了处于封闭的、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姑娘们，对于大千世界的向往。”^②），实际上是台儿沟的姑娘为一分钟的“被看”而倾尽全力、倾巢而出。就这样，无论从本质论还是从建构论来说，台儿沟都被自发也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设置了性别，达成了“城/乡性别化”的修辞目的。

3 郜元宝曾在一篇讨论孙犁、铁凝的综合性文章中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孙犁式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柔顺之美”其实是1940年代革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一脉，而在精神线索上与孙犁颇多渊源的铁凝，在文学上所继承的恰是“四十年代后半期成熟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一份隐秘遗产”^③。郜元宝甚至在文章的一处小标题中直接将铁凝称为“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这样的论断，揭示了铁凝一直以来在文学写作上的一个方向性的自我设定，即对“政治正确”——尤其是国家主义、时代主流——的考量与迎合。因此，当“现代性”在1980年代初上升为国家话语并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时，《哦，香雪》就成为其一个文学性的注脚。也因此，王蒙在评论铁凝的作品时这样说：“香雪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翻开作者最早的一批习作……我们不是都或隐或现地看到香雪的一双善良、纯朴、充满美好的向往，而又无限活泼生动的眼睛吗？在描写青年与青年写的作品里，这样的目光实在是凤毛麟角！那些作品里，出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的，多半是一些批判的、受过伤害的、深沉痛苦有时仍然是热烈执着，有时是冷峻严肃、有时甚至是‘不怀好意’的眼睛。而铁凝的作品完全不同。”^④所谓“完全不同”，指的就是铁凝的作品是“柔顺”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不怀好意”），但这并不意味着铁凝以所谓的“柔美”、“清新”、“诗意”游离于由“伤痕”、“反思”所标注的时代气质，相反，她不仅积极顺应了1980年代主流的政治与文化逻辑，并以自己的文学深刻地参与建构了这个时代主流的政治与文化逻辑。所以，我们才会理解，香雪揣着在火车上用40个鸡蛋换来的泡沫塑料铅笔盒，在漆黑的深夜里步行30里山路回家的残酷情境，为何被铁凝硬是“处理得异常柔美”，因为只有“让香雪姑娘流出‘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才契合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民众的精神面貌”^⑤。

当然，对于铁凝或铁凝研究来说，将她的“城/乡性别化”这一隐微修辞予以揭示，或许是更具意义的。尽管铁凝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带有显见的性别话语色彩的作品，但我相信，那只是因

① 李子云 《致铁凝——关于创作的通信》，《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创刊号。

② 李清泉 《短篇小说的年度记事》，《文艺报》1983年第6期。

③ 郜元宝 《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④ 王蒙 《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文艺报》1985年第6期。

⑤ 郜元宝 《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为女权或女性主义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崭新维度，成为铁凝务须用“柔顺之美”、“柔顺之德”加以顺应的文学律令。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写作《哦，香雪》时，她剥削、榨取、利用了妇女形象，当然也同时贬损了妇女。她在由现代性逻辑所宰制的“城/乡”叙事结构中，直接而断然地将妇女判为历史的负面。《哦，香雪》受到了时代和社会的全面欢迎，这不仅说明铁凝的隐微修辞是成功的，同时也说明这样的修辞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所渴慕的。铁凝因为《哦，香雪》而迅速迈入中国文坛的中心，时代和社会对她的这种抬举，放大和巩固了这一隐微修辞的美学效果，并使之跨越美学，漫入政治和文化领域，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情感模式。时代和社会对她的抬举，同时也说明，那种旨在贬损妇女的修辞格是一种普遍的、恒久的心理结构，它与一种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压迫模式——父权制/男权制——有关，铁凝在《哦，香雪》中所做的，只是重新召唤了这个结构。而微妙处恰在于铁凝本人的性别身份：某种意义上讲，铁凝也是被剥削、被榨取、被利用的女性。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19世纪西方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使用和共享一种特定的叙事修辞，这个修辞由设定在文本内部的一个双层结构所呈现：在其结构的表层，一些粗糙的父权/男权话语覆盖其上，女性在这个叙事层面上表现为柔顺、臣服的面貌和倾向，但在结构的深层，作为亚文本（sub-text），抵抗的、颠覆的倾向无时不在消解看似坚硬的表层结构（父权/男权话语）。然而，在铁凝的《哦，香雪》中，那个作为隐微修辞（城/乡性别化）的亚文本，不仅有力地支撑了表层结构，同时还以对女性形象及其历史价值的强横去势，在政治和文化上走向了与铁凝的性别身份截然相反的方向。或许，我们可以回答本文起首提到的问题——《哦，香雪》就是铁凝那部让读者尤其是让女性读者“迷惑、忘情甚至受骗”的小说。

当然，“城/乡性别化”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性修辞，既非文学专属，也非铁凝专属。但由于铁凝的特殊身份，由于《哦，香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醒目地位，以及三十多年来对这部作品的解读、研究不断地在引导读者偏离对这个隐微修辞的发现，从而，这一修辞的政治性便不期然地愈发显赫起来。实际上，到了1990年代，“城/乡性别化”在中国文学中便有了升级版：当中国在被愈益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后，中国作家在“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中开始与比中国更为强大的国家形象碰撞时，一种可称为“国族（种族）性别化”的叙事修辞悄然而生。这个升级版的修辞，由男（欧美白人）/女（中国女人）这样的结构来呈现。在王安忆的《我爱比尔》中，中国女孩阿三所迷恋的“比尔”是一个有强大符号意义的美国男性形象——在这部中篇小说写作和发表时，“比尔”是全美甚至全球范围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名字，因为它同时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名字。在这部小说中，随着时光流逝，比尔的面容在阿三的记忆中逐渐模糊，但与一个西方白人的这段情感经历却无法在阿三的内心中抚平，她甚至堕入风尘，通过与一个又一个外国人的结交，来维系和刷新对这段感情的记忆。说到底，阿三的“我爱比尔”究竟爱的是什么？这似乎已是不言而喻了。而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干脆将女主人公倪可的中国男友天天设置为性无能，肉体衰微，精神颓靡，最后吸毒而亡（这与铁凝将台儿沟的男性全部屏蔽的做法异曲同工），而倪可的德国情人马克则是个性能力超强的强悍男性，他轻易地掳掠了倪可的肉体，并使其欲罢不能。卫慧不吝笔墨地大段渲染充满力比多气息的场景，把对一个白种男人的惊呼和迷恋，写到漫过了纸边。后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隐蔽地转化为性别政治。在这场性别政治的象征性博弈中，“现代性”的先发国族炫示其优势，后发国族呈现其焦虑。而女性，是这场博弈中唯一被贬损和被牺牲的。

由于《哦，香雪》是在所谓“新启蒙”的语境中，以城/乡架构突现当代中国对于现代性价值的历史认同，因此，“城/乡性别化”其实也曲折地反映了女性与现代性之间所存在的政治关系——一种隐晦的、被“文明觉醒”、“自我追求”等“新启蒙”语汇所重新包装的性别政治。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

“现代性”为这个世界重新派定了诸种权力结构。这其中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全球范围的政治地缘结构。当然，所有人深陷其中的“性别结构”也自此派定……在中国，或许是因为“现代性”的魅惑，或者是因为对“现代性”之合法性的前提性认定，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研究大多将批判性的结论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内，而殊少指向“现代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是“现代性”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批判的武器——这包括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以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屡试不爽的个人主义话语。在她们看来，性别这一权力结构先于“现代性”而存在，但在进入现代以后，在“现代性”的宰制下，这一结构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①

这段文字是针对近二十年中国女性写作的批评和研究而言的，它实际上也可以用于描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及其研究对“现代性”的臣服，因为在无可避免地被“现代性”所裹挟之后，在简单地将“现代性”等同于“进步性”的机械理解之后，女性写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定义成追求“更为现代的人生”。这样的结论，差不多是基于一种集体的盲视：大多数的研究者并不清醒地意识到，她们当下正身处其间并竭力批判的“性别结构”，其实就是她们竭力追随的“现代性”所派定的。

香雪在火车启动的最后一秒，摆脱了犹豫，完成了用40个鸡蛋换取一个文具盒的交易。她象征性地搭上了“现代性”的快车，因此也象征性地获得了拯救。“获救”这一主题性修辞公然使用以及文具盒这一软性意象所递送的关于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的巨大优势，使得交换的不平等、独自步行30里夜路的凄惨，突然变得无足轻重。针对“现代性”的批判之矛于是再也无力举起。郜元宝在批评铁凝此处表现出的“柔顺之美”时指出，所谓“柔顺”就是“将无法直面的悲惨丑陋予以淡化或美化，赞美人的柔顺之德，并以柔顺之德为超越的价值根基，对现实进行委婉的指责和虚幻的超越”^②。实际上，平心而论，更为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在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宰制下，铁凝和香雪一起身陷“获救”的巨大幸福而难以自持，于是，她迅速进入“纯净”、“柔美”、“至善”的诗意抒写之中，并在结尾处陷入“哦，香雪！香雪！”的一唱三叹，以几近“无词的言语”映示无以名状的激动与欣悦。只是这一刻，铁凝全然不曾意识到，香雪以及台儿沟的众姑娘，只是现代性这一巨大的社会机器启动时必不可缺的道德润滑剂而已。

二十多年之后，铁凝在一篇自述文字中对《哦，香雪》进行了反思性的回顾。她承认，“火车它其实也是一种暴力”：“火车的到来，火车的‘温柔的暴力’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少女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将永远清纯透顶的可爱。”她发现二十年后的香雪们不会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的变化仍然可疑，善恶难断，只是肯定失去了“纯净”、“柔美”和“诗意”的品质。但出于“政治正确”的认知惯性，铁凝仍然认为“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③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至少在某个瞬间，关于《哦，香雪》，铁凝承认自己“被那猝不及防的精彩迷惑过”，并且有了“片刻的迷惑，片刻的忘情，甚至于片刻的受骗”？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王侃 《个人主义、性别结构及现代性》，《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

② 郜元宝 《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③ 铁凝 《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